

司馬遷與希羅多德 (Herodotus) 之比較

鄧 嗣 禹

- | | |
|--------------|-------------|
| (1) 時代背景與傳記 | (4) 史學方法與史觀 |
| (2) 作史的動機與目的 | (5) 優點與劣點 |
| (3) 史書之組織與範圍 | |

司馬遷爲東洋歷史之祖，希羅多德爲西洋歷史之祖。兩人的著作，已並垂不朽；兩人的大名，常相提並論。而專門比較他們二人的文章，似乎很少見。因將此兩大史學鼻祖之生平及著作，作點綜合比較的研究。

當然在司馬遷以前，中國已有史學家，如孔子左丘明。在希羅多德以前，西洋也有史學家，如 Hecataeus of Miletus 及 Hellanicus of Lesbos，司馬與希羅是承先啓後的大著作家。他們將寫著歷史，成爲一種專門的學問，創造歷史學，故享受始祖的盛譽。他們雖非同時代的人（史遷生于紀元前二世紀，希羅生于紀元前五世紀⁽¹⁾），而在東西史學界，佔同樣重要的地位，故可以比較討論。

(1) 時代背景與傳記

大概是 135 或 145 b.c.⁽²⁾司馬遷生在陝西西安附近的仕宦之家。他的祖先們世典周史。古代史官的傳統是必須具有豐富的學識和眼光，知巫祝卜筮之事，兼有公正不阿，鐵面無私的職業道德。史官是政治家、預言家和新聞記者合而爲一的人物。⁽³⁾他的父親司馬談，是個博學的人；學天文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爲漢武太史公，職掌天時星曆，典司紀錄，保管文獻。當時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紀元前 110 年卒。司馬遷承繼父親的學問及職位；所以他是一個有家學淵源的人。

他生在西漢隆盛時代。當時的版圖廣大，東至朝鮮，南至安南，西南至黔滇，西

至新疆乃至中亞。殊風異俗，傳至中土，可引起少年人的好奇心，激發少年人的遊歷狂。當他十歲的時候，他已經從名學者孔安國習尚書，到二十歲的時候，他隨着祖國新興事業的發展，開始遊歷全國的壯舉。首先“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以印證他從前所得的書本上的知識。“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因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乃“仕爲郎中”，扈從天子，巡幸四方，又開始了第二度的遠行。他曾“奉使西征巴蜀，南略邛笮昆明”，所以他的足跡，幾乎遍中國本部。時間前後經過十餘年，大概在他二十至三十五歲之間(4)。

司馬遷遊歷的目的，似乎主要是過歷史癮，訪求名勝古蹟，考察人證物證，以及風俗人情。他可以說是田野考察工作的開山大師 (a pioneer investigator of field work)，舉例來說吧。

“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史記” 78. 22)(5)

“吾適豐沛，問其遺老，觀故蕭曹樊噲滕公之冢，及其素，異哉所聞。”(史記 95. 35)

司馬遷將書本上的知識，國家圖書館的檔案，地理上的考察，與社會上的經驗，冶于一爐，融會貫通，打成一塊。誠如傅孟真所說，“史記是讀古書治古學的門徑書。”(6) —— 是一部集大成的書

現在讓我們看希臘名史學家，希羅多德。他被稱爲說故事之王 (the Prince of Story-telling)，歷史之父 (the Father of History)，與人類學家之祖 (the Father of Anthropology)。在紀元前五世紀的時候，希臘有雅典與斯巴達之爭，又欲將波斯人的勢力，驅除消弭。五世紀前半期，希臘王政衰頹，專制盛行，崇貴族，屈平民，希羅多德即生于貴族家庭。他的出生地是小亞細亞的 Halicarnassus，那時小亞細亞在波斯人統治之下，故按國籍法，他生爲波斯人，可是僑居在小亞細亞的希臘人，常常想慕他們的祖國——歐洲希臘。大概年三十或三十五歲以後，他因故被迫離開他的生長地，住在雅典自由城。後又參加建設雅典在意大利的殖民地，Thurii 工作；他也許在 B. C. 430 年左右，死在這個地方。

希羅多德的父母，都是有身份的高級貴族。他的兄弟 Theodore，堂兄弟 (一說

— 446 —

uncle) Panyasis 都是有名的詠史詩人 (epic poet)。他生在一個充滿古詩，古神話，故事以及酷好自由的家庭，自小就練習說故事，說給他的父母聽，兄弟聽；說的不好，他們替他改良；說好了，又另找故事。在這樣的家庭，從最小的時候起，希羅多德就受了很好的文藝訓練，環境薰陶。稍長，他愛窮搜博覽，當時所有的韻文詩歌，幾乎閱讀殆盡，此後成為古代最優美的散文家之一⁽⁷⁾。所以司馬遷與希羅多德，都是有家學淵源的人，這是他們生活相同點之一。

跟司馬遷一樣，希羅多德也愛遊歷。他好奇，希望多知道人間一切的事情，因而在壯年的時候，到處去遊歷，他的足跡，不但印遍了希臘，也去過好些外國，如波斯、Assyria、巴比倫，跟 Scythia。他在埃及住過長期的時候，尤其是在尼羅河畔，勾留得很久，觀察得入微⁽⁸⁾。黑海沿岸，以及巴力斯坦一帶，他都觀光過。以時間論，他也差不多遊歷了十七年(從20至37歲)。他們兩個人的遊跡，都踏遍兩個人所知道的世界。可惜司馬遷不知有希臘的存在，希羅多德也不知道有中國的存在⁽⁹⁾。

希羅多德遊歷的動機，似乎與司馬遷的不完全一樣。司馬主要是過歷史癮，希羅起初彷彿是以商人的資格出遊。因此之故，他很小心的留意各種商品，如肉桂，桂皮 (III, 110-111)，麻布 (II, 105)，麻衣，角類 (IV, 74, VII, 126) 以及俄國南部的鹹魚 (IV, 53)。他愛描寫運輸方法，如幼發拉底與尼羅河中的船，尤其是他們的載重量，(I, 194; II, 196)。他注意到河中可以通航的階段，如在幼發拉底 (I, 194, 5) 與尼羅河 (II, 96,3)。他說到奇異的交易方法，如七譯之商業隊，及西非洲以手指作交易之法 (IV, 196)。他注意金銀礦，及其開礦的方法與收入 (III, 57; VI, 46, 47; VII, 112, 144; I X. 175)。因此種種，可知希羅多德是以商人資格，或同商人旅行⁽¹⁰⁾。

希羅多德的求知欲與好奇心，非常旺盛。他愛談奇禽怪獸，奇風異俗，婚姻禮節，食人肉之習，以敵人的頭顱骨為飲器 (IV, 65)，以生人殉葬 (IV, 71)，插血為盟 (IV, 70)。各種人的皮膚色澤，家庭用具，生活狀況，他皆加以仔細的觀察與描寫⁽¹¹⁾。(司馬遷在匈奴、大宛等外國傳，也談到這樣的事情；但在其他部份，限于體例，不能隨便插述)⁽¹²⁾希羅多德說，Souromatai 的女子，一定要殺掉一個與她本族為仇的敵人，才可以結婚。(IV, 17)，他發現 Mount Pangain 人實行一夫多妻制。(V, 16) Lycians 人依母命名而不依父命名 (I, 173) 巴比倫有著名出賣女子的市場。(I, 196)

Thracians 有花錢買妻子的 (V, 6), Pelasgians 或斯巴達人似乎實行過用武力強搶別人的女子爲妻奴的辦法, (VI, 64. 138)。他又說埃及人食蓮藕及蓖麻子油 (II, 92. 94) 巴比倫人常食將乾魚搗碎的魚粉 (I, 200), 也許把苧麻葉子作煙抽, Scythians 人愛食麵粉、葱、蒜、扁豆 (IV, 17) Libyans 人竟吃蝗蟲 (IV, 172), 猴子 (IV, 194) 跟虱子 (IV, 168)。有的 Libyans 人, 把頭髮前部剃光, 後面留長, 或左邊剃光, 右邊留長。(IV, 175, 180; V, 191), 其他衣服、墨面、文身等制, 希羅也加以描述。他確是一個不憚煩勞, 仔細的, 聰明的觀察者。所以他被稱爲現代人類學之祖, 或稱之爲古代的馬可孛羅⁽¹³⁾。他的頭銜, 確是不少。

可是希羅多德並沒有忽略歷史。在他的遊歷當中, 也許在 Ionia 地方, 在 448 年以前, 他草成了一部波斯史。很顯然的他一面遊歷觀察, 一面著書, 大概到了他快要衰老的時候, 大改變計劃, 把他的波斯史改成現在的樣子。他晚年以公開說書爲職業, 他去世後兩三年, 書中的內容, 即在雅典戲院中排演, 劇場中的聽衆, 好像對三國志演義一樣, 多半熟悉其中的情節⁽¹⁴⁾。

結果, 希羅多德的書, 是一部歷史、考古、人類學、民俗學各方面兼收並蓄, 娓娓動聽的名著。他講埃及波斯等國的古史, 遲到現在, 還有參考的價值。因爲材料豐富, 方面廣博, 若以俗手寫成, 一定變爲零零碎碎的雜貨攤; 但以希羅多德的高潔文藝處置之, 成爲布置整齊的博物館的陳列品。他雖然不是單刀直入, 平鋪直敘的寫法, 而是隨處離題旁涉的記述, 却能引人入勝, 讀之聽之, 都覺得津津有味, 從文筆論, 從保存古代傳說資料而論, 希羅多德的歷史, 已證實了它能長久存在的價值。

(2) 作史的動機與目的

從他們的著作看, 司馬遷父子都是聰明種子, 有學問, 有見地, 有本領的人。否則司馬談不能以寥寥九百餘字, 暢論六家要旨, 原始要終, 長短得失, 一覽無遺。司馬遷也不能以五十餘萬言, 寫出一部包括兩千餘年, 體大思精的通史。他們父子有本領, 也有脾氣, 不甘受委屈。作史記的動機就是因爲不甘受委屈, 要洩憤, 才努力完成的。司馬談若爲庸碌之人, 尸位素餐, 漢武帝不叫他去參加封禪泰山的盛典, 一時不愉快, 不久也就處之泰然了。他可不然, 他氣憤, 傷感, 以致于病; 病到臨亡的時

候，握着兒子的手，哭着說，“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常顯功名。……今天子……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無忘吾欲論著矣 (130, 17-18)。”這樣才可以藉一部大著作使後人知道他的名字，不致爲漢武帝所輕視而湮沒無聞；他未能參與封禪泰山的典禮，就可以補償了。於是司馬遷俯首流涕曰，他一定要謹遵遺命，完成這部史書。

可惜司馬遷比他父親更不幸，在紀元前99年，爲相識人（並非莫逆至交）李陵降匈奴事，說了幾句公道話，武帝使他受腐刑。壯年人無辜受此酷刑，他的冤屈忿怒，遠在他父親之上。既乏生人樂趣，又不願愚昧自殺⁽¹⁵⁾，只好咬緊牙根，聚精凝神，完成一部好書。因此他作史記的動機，一是恪遵父命，一是發洩受腐刑的恥辱。他自己也說古來許多名著，都是受了大刺激而產生的⁽¹⁶⁾。

他立志要寫一部垂之萬世的大作，要承繼孔子作春秋，使亂臣賊子懼。他不願率爾操觚寫文章，而是將所有的資料收集起來，精細安排，條理井然。好學深思，將古今事物，原始要終，見盛觀衰，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種大抱負，他算是達到了。

希羅多德的生活傳記，後人知道的很有限⁽¹⁷⁾。據說他堂兄弟，Pynyasis 爲反對波斯統治者，犧牲了生命。希羅多德，也被放逐于其生長地Halicarnassus之外⁽¹⁸⁾。因此他選擇了一個研究題目，東西之爭，——東方波斯人與西方希臘人之爭，在放逐生活當中，他到處遊歷流蕩。最初，如前所述，有點商業性的好奇，或隨商人同遊。由好奇而搜羅了各種奇風異俗。在這種過程當中，他的主題，東西人之爭，縮小爲波斯侵略希臘之爭。未在本題以前，他要推究自由與專制之戰的原因。他描寫各種宗教、風俗、城市、建築、生活習慣。凡是希臘人及野外人 (Barbarian) 的大事，他都要記載下來，使人不致於遺忘，兼使人知道彼此鬭爭的原因。他想以客觀的態度，記述往事，將有趣味的故事，隨時解釋，隨時穿插以增進聽衆的興趣，增加他以說書爲職業的收入⁽¹⁹⁾。他起初將史書朗誦給觀衆聽時，不很受歡迎。受了這點挫折，他到典雅去居住，在445年的時候，才接受了雅典公民的獎狀同獎金，其數量約當于現在1,500元⁽²⁰⁾，不無可觀。

由此看來，希羅多德作史的原動機，是由於被放逐，與司馬遷受腐刑，同爲“發

憤”而作。希羅多德作史的目的有三，一是述往事知來者，使人不致于遺忘。二是找出東西兩大民族相爭之理由與背景。三是將史事說得娓娓動聽，以便叫座賣錢。他似乎沒有司馬遷之“藏之名山，傳之其人”的遠大雄圖。

(3) 史書之組織與範圍

史記包括十二本紀，八書，十表，三十世家，七十列傳五部份。十二本紀，紀列代帝王的國家大事，近于政治史綱，八書近于社會，經濟等及文化史制度史。十表近乎年表。三十世家是封建時代的國別史，及其有功於國的諸侯，有影響於社會的特殊人物史。七十列傳，近乎普通人物的傳記和社會思想史。司馬遷從社會各階級中，挑選一百六七十個人物，將他們分類如循吏，刺客等，以代表春秋戰國至秦漢時代的社會生活，文化思想，以及“四夷”與中國的關係。這種紀傳表志體，又簡稱爲紀傳體，司馬遷創始以後，成爲中國二十六種正史的典型。天下古今萬物的史料，不管大小，皆可包羅，錯綜爲體，詳略互見，史記全書有整個的組織，每篇有各別的結構。每篇前後，多有論贊，彷彿新聞社評之提綱挈領略示已見。篇中則多以客觀的態度，敘述史事。故中山久四郎說，司馬遷爲紀傳體正史之創始者，論贊之創始者，年表書志之創始者。又自序中之六家要旨，開學術史評論之先河⁽²¹⁾，司馬遷的史記，確是體大思精，他有綜合，歸納，與創造的天才，前人評他的體例爲因襲，不足爲憑⁽²²⁾。

希羅多德書之組織與範圍，比史記要簡單狹小。他的書，好像一種博士論文，主題是紀元前 490 年左右的波斯(侵略希臘的)戰爭，而他在入本題以前，寫了一篇很長的導言，佔全書約三分之二。在導言部份，主旨是清流溯源。全書分九章 (books)，六章爲導言。

第一章回溯遠古以來歐亞之爭，及波斯國之發達史，第二章述波斯侵略埃及因而考察埃及的歷史。第三章述 Cambyses 之征服埃及及其遠征 Ethiopea 與 Ammonia 之失敗，第四章述波斯王 Darius 之征 Scythians，因而談及北歐各民族之風俗，宗教與社會情形。第五章述波希相爭。第六章分析彼此相爭之原因。490 年波斯人在 Marathon 戰敗後，其國王 Darius 預備再戰等情。第八章希臘聯軍在 Salamis 大挫敵軍。末一章寫 480 年在 Thermopylae 之殊死戰，雙方損失慘重。可是波斯人侵略

希臘的雄圖，終未如願以逞，失敗而歸。

這是全書主要的骨幹，希羅多德却是從容不迫，輕描淡寫，用非正式的，說故事的體裁，寫希臘的悲劇隨時離題，插入其他許多相關聯的故事，人情哲理，將重要史事的政治地理社會文化的背景，和盤託出，令人讀之或聽之，有時如閱莊子寓言，天方夜談，或三國志演義，有時如在雄辯會中，戰爭場中，輕輕鬆鬆，感覺愉快，不必聚精凝神，記人物地名，年月時日，而主要的故事，自然印入腦中。所以希羅多德享盛名二千餘年，其書至今仍爲人所誦讀。

在西洋學者當中，有認爲這位“歷史之祖”頭腦很簡單的⁽²³⁾，也有人以爲古代西洋人寫史，是件容易的事，只要根據官方對事情的看法，能使讀者痛快滿意，不必證明某種學說與理論，就算成功之作⁽²⁴⁾，希氏以聽衆的興趣，爲選擇與佈置材料的標準，原書並不分章分段，現在的九章，是1608年印行時，編者替他勉強而分的⁽²⁵⁾。其書雖目爲通史，而忽略三個重要的國家，Phoenia, Carthage及 Etruria；雖詳紀戰爭，而對於 Trojan 之戰，言之極略。希羅多德的原來計畫也許就不想包羅萬有。可是以希氏遊歷之廣，見聞之富，印證之詳，敘述之美，雖至今日，他的書，仍是研究五世紀前希臘、波斯、埃及等國之必須參考書，他的貢獻也算不小了。

(4) 史學方法與史觀

司馬遷的歷史學方法，是先勤讀十年，然後遨遊全國，以印證所學。後又窮搜博覽，再事遊歷，將兩代（他父親及本人）所經營的歷史著作，徐徐佈置整理，細細思量考察。故能綜合前代史料而加以創造。

論其所據資料，有用現成的書篇，——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整齊百家雜事。有用父親的舊檔，“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無忘吾所欲論著⁽²⁶⁾。有用自己所搜集的材料，實際的見聞，與好學深思的推斷。“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年間，斯亦勤矣！”

他將辛勤搜集的資料，常常註明出處。在他全書中，他說明採用之書籍者，凡三十餘處，如殷本紀，“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于詩書，“五帝本紀”，余觀春秋國語⁽²⁷⁾等，大概當時所有的書，多已採用。其不見書本而註明聞之

人證者亦十餘處，如“吾聞之周生曰”，(7. 15項羽本紀)。“吾聞馮王孫曰”，(43. 96. 趙世家)等。其得之目覩及物證者又十餘處，如“適魯，觀仲尼廟堂車服禮器”(47. 93. 孔子世家)，“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84. 36. 屈原傳)。“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124. 17. 游俠列傳)。又如觀張良之圖，“狀貌如婦人好女”(55. 31. 留侯世家)又有採之于書或聞之于人而辨其不然，示以論斷者，如五帝紀，“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余嘗西至空桐，北過涿鹿，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1.66)。仲尼“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子問，並次爲篇，疑者闕焉”(67. 53. 仲尼弟子列傳)。可見司馬遷的史學方法之一，是異說紛紜，莫衷一是時，根據一種比較足資憑信的材料。但他不願人云亦云，而在可能的範圍內表示獨到的見解。如周本紀，“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4.96)又如刺客列傳，“世言荊軻，其稱太子之命，……又言荊軻傷秦王；皆非也”。(86. 39-40)如酈生陸賈列傳，世之傳酈生書，多曰……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97. 28)“世言蘇秦事事多異……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念獨蒙惡聲焉”。(69. 62蘇秦列傳)，“人皆以李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異”，(87. 45-46)，可見司馬遷有疑古和考證學的方法。

若證據不足時，如老子問題，呂尚事周問題他採闕疑的態度，所謂“疑者傳疑，蓋其慎也”(28)。間或對於歷史原因不能充分解釋時，他歸之于“天”或天命，他的“天命”似爲上帝的主宰，或許相當乎數學上的無窮大 ∞ ，令讀者自己去決斷吧(29)。

對於史事的駕御，時代愈近司馬遷的記載愈詳。錯綜複雜的史事，若用文字描述，或使人不能卒讀，史遷乃列表以明之，使人一覽無遺。普通習見之事，常見之書，或略而不談(30)。他的史學方法，似乎相當近代化。

司馬遷的歷史觀，可說是社會史觀。他大量地紀錄普通人民的生活，把社會人民的生活，作爲歷史研究的對象。他對於古今許多特立獨行之士，爲人格正義而奮鬥之士，如伯夷，田橫，汲黯非常推崇。對於趨炎附勢的衛將軍驃騎，則甚痛恨。他表彰游俠，稱“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蓋亦有足多者焉”(64.3)又曰“有足多者”，有足祿者，“曷可少哉”他尊敬布衣“歌頌郭解，荊軻，信陵君，蘭

相如，魯仲連，陳涉，項羽等不同類型的英雄。如云“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81.25)”。又云“魯連其指意雖不合大義，然多其在布衣之位，不詘于諸侯，談說于當世，折卿相之權。”(83.33)他敢于指斥帝王，貶抑權貴，揚發黑幕，暴露罪惡。對於皇帝之愚昧殘暴，往往極盡諷嘲之能事。他寫循吏傳五人漢無一人。酷吏傳十人，而九人在漢武帝時，所謂相形見絀，相得益彰。他有廣大的興味，廣大的同情心。帝王諸侯的事，他感覺興趣，寡婦流氓（即游俠）的事，他也感覺興趣。他沒有中國傳統的正統歷史觀念，專為帝王歌功誦德，而忽視其他。他敢為項羽與呂太后作本紀，為孔子與陳涉作世家。他的歷史，是以全社會為對象。傳記人物的選擇也是看他們對社會有無貢獻與影響為標準，凡是有貢獻有影響于社會的，不管智愚貧賤，成敗得失，皆傳其人。故以文治名于天下者如管晏商鞅，以政運名于天下者如蘇秦張儀，以豪邁名于天下者如孟嘗平原。以經管影響社會者如卓氏宛氏。以行動影響社會者如刺客，游俠，滑稽，各傳，皆是為全社會着想。

司馬遷的歷史觀與人生觀，有不可分離的聯帶關係。若不懂他的人生觀，也難完全了解他的歷史觀。他是一位非常容易傷感的人。例如“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于君臣相敕，維是幾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24. 2. 樂書)。“讀樂毅之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也”(80. 17)“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84-36)。“讀春秋曆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14.3)。“余讀功令，至于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121.2)。因為他是這樣的易于傷感，所以他有廣大的同情心。他唸書時，也彷彿時時刻刻不忘史官的職責，與見地。

司馬遷是一個講自由主義，個性很强的人。他的見解，不能為任何人所左右，任何威武所屈服。他能父子異趣。父親崇拜道家，而他却崇拜儒家，繼孔子作春秋，以仁義為準則⁽³¹⁾。他能獨排衆議，替他相識的人李陵說公道話，而不顧盛怒之下的武帝的意旨。

因為個性強而對於史官的責任心重，所以他能堅守公羊左傳之筆誅傳統，時時求真理，不黨同伐異；與史事以嚴正的批評。舉例來說吧，他最崇拜項羽，比之于舜，誇之為“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可是他評論項羽曰，“自矜功伐……謂霸王之業，欲

以力征，經營天下……身死東城，尙不覺悟，而自不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7.75-76)。可見他的態度很公平。司馬遷評袁盎鼂錯，(101)魏其，武安，灌夫，(107)公孫弘(112)，皆很坦白。漢劉向楊雄等人，皆以爲司馬遷的長處，在“不虛美”，“不隱惡”。

司馬遷以嚴正公平的態度，發揚他的社會史觀，凡渺視民瘼者，宜受誅討，“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勿堪，……湯遂率兵以伐夏桀。“(2.49)“吾適北邊，……行觀蒙恬所爲秦築長城亭障，……固輕百姓力矣，……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88.11)

史遷反對嚴刑峻法，在酷吏傳，他引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122.2-3)。在呂后紀，他說，“刑罰罕用，罪人是希”。(9.38)

他提倡仁義。仁義二字，與法治相反，與孟子所謂“王道”，儒家所謂“德治”相近。他說一個國家，“形勢雖強，要之以仁義爲本”(17.7)，一個小國能長保者，也要“篤于仁義，奉上法”(18.3)孝惠及孝景追修功臣，“諸侯子弟若肺腑，外國歸義，“咸表始終，當世仁義成功之著者也”。(19.3)

司馬遷常從史事中求教訓，得經驗，把歷史作爲修身齊家治國的教科書，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6.91)“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18.5)在酷吏傳，他說“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污者足以爲戒”(122.45)，從歷史教訓中，觀察一些日常生活的哲學。如云“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亡戰必危”(112.12)“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8.88)這是他所看出的歷史周期性。“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也”。(50.8)他喜引諺語，以表達日常的人生哲學。例如“語有之，以權利合者，權利盡而交疎”(42.37)。又曰“女無美惡，居宮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疑”(105)。

希羅多德的史學方法，在資料的搜羅與鑑別上，與司馬遷的相彷彿。他書中材料的來源，可分爲三種，一爲有文字的記載，如古詩散文，說書(logographoi)，占卜詞(oracles)演說詞，與檔案。他也用了一部份波斯政府的檔案(III, 89-97, V, 52-53)，

而以說書式的歷史 (logi) 用得相當多。二爲考古學的材料；他用了 Amasis 與 Ladice 的石像 (II, 182; I, 181.5)，Scythia 國的靈墓 (IV, 71.1)，巴比倫皇后 Nitocris 的靈墓 (I, 187)，戰爭紀念碑 (VII, 225, 228) 古寺廟 (II, 101.2, 110) 埃及金字塔等。三爲口述的資料，經他多年遊歷與考察得來的。而且這樣的材料，在他書中佔一大部份。例如他在第二章中對於埃及仔細的描寫，據他說，他的材料，多半是根據他自己的考察和訪問 (II, 29)。

說書家開希臘歷史之先河，他們想建立希臘的歷史，注重地理學與民俗學的資料，以增加聽衆的興趣，促成歷史的發展。這些資料，希羅多德加以充分的利用。他自己所蒐集的口碑資料，尤足以表示他的史學方法。他跟四十多個希臘城市的市民談過話，徵求材料⁽³²⁾。有時他也說明材料的來源 “In all this I only repeat what is said by the Libyans” (IV, 261)。或述異聞 “Besides this there is another story told, which I do not at all believe” (VII, 423)，如傳說有誤，則改正之 (IV, 192)；或就所知者改良之。“yet so much I do know” (VII, 152)，或存疑 (II, 123; IV, 195; V, 9)，或闕疑，如對於歐洲地理，因他所知甚微，則略而不言⁽³³⁾。或疑信參半，他相信北歐產多量的金子，但不相信有一隻眼的民族，叫作 Arimaspi，他們將金子從別處偷來的 (III, 117)，對於 Scythian 的人種與國家的起源，希羅多德先引 Scythians 人自己的傳說，而他自始就說，“I do not believe the tale,” 次引希臘人關於 Scythians 人來源的說法，再次又引比較近乎情理的普通說法。他說：

There is also another different story, now to be related, in which I am more inclined to put forth than in another. It is that the wondering Scythians once dwelt in Asia, and there warred with the Massagetae, but with ill success; they therefore quitted their homes, crossed the Araxes [Volga], and entered the land of Cimmeria. (IV, 5.8.11)

從此可知希羅多德的史學方法，與司馬遷是同樣的謹慎，但希羅多德似乎多用常識與邏輯學的判斷，顯得更科學化。司馬遷喜用抽象的描寫，以求行文的流利與簡潔；希羅多德却愛用具體詳細的描寫，以求敘事逼真，使人相信他所說的故事，使聽者覺得他是觀察入微。如關於埃及之土壤成分，氣候潮汐，他有時議論風生批評衆

說，表示已見，如關於尼羅河各問題，使人讀之，樂而忘倦。有時他用統計數目字，描述人物，使人覺得他很科學化。

Wonderful as is the Labyrinth.....The measure of its circumference is sixty schaeenes, or three thousand six hundred furlongs, which is equal to the entire length of Egypt along the sea coast. The lake....in its deepest parts is of the depth of fifty fathoms....In the center there stand two pyramids rising to the height of fifty fathoms 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water....Thus the pyramids are one hundred fathoms high, which is exactly a furlong (stadium) of six hundred feet....II. p. 134.

希羅多德愛用數目字描述。如在第七章中，記載海陸軍人數，為 2,317,610 人，或 2,461,610 人 (VI, p. 414)。他說，波斯海陸聯軍，竟有五百餘萬人。據識者云，他的統計數目，多不可靠。他的天文與數學知識，非常薄弱。甚至加減乘除，亦常多誤。(34)

希羅多德的史觀，第一似為乘客觀的態度，求記載的翔實：

If things happened so or not, I know not, but I write what men say. For myself, [he says] though it is my business to set down what is told me, to believe it is not at all my business; let that hold for the whole of my history.⁽³⁵⁾ 所以他在書裏，他開章明義說，他要保存 “the great and wonderful actions of the Greeks and the barbarians from losing their due meed of glory.” 其結果是 “in spite of his fondness for a good story and tendency to romanticize, there is no conscious dictation; that he was an honest and veracious historian....What Herodotus sees, he describes clearly, what he hears he relates faithfully, and he bestowes the same care on the composition as he had bestowed on the investigation.⁽³⁶⁾

歷史家可不僅是以客觀的態度，求公平翔實的記載，而第二步在求真理，歷史大事，不是單獨的存在與發生，而與其他事件，有互相關聯互為因果的地方。史家的責任之一，是尋出前因後果。這與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是一樣的用意。希羅多德，

注意考察，留意尋源，——人類國家之源，甚至于尋尼羅河的河源。

見解與判斷，是希羅多德第三個着重點。他說：

“In any experience, good judgment is more valuable than any other accomplishment. Even if something goes amiss the soundness of original judgment remains unaffected and its frustration is due to Fortune.” (VII. 10)

在他書中，他常常侃侃而談，申述他自己對於某個問題的見解。

希羅多德也酷好自由。他以為東西亞人之爭，主要為自由與專制之爭。一個國家，最需要的第一是自由，第二是自主，第三是非專制的政體，第四是民主政體，他自己想作一個典型的希臘人，最喜歡雅典的自由，有人說，他也許以這本書教訓青年之愛自由，崇拜英雄，不怕犧牲⁽³⁷⁾。他推斷希臘之所以能戰勝波斯人，是因為民主政體。在民主政體之下，每一個公民覺得是為自己的自由而戰，非為專制君主而戰⁽³⁸⁾。

這些觀點，表示希羅多德之思想，是現代的。

可是他的宗教哲學史觀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history)，就顯得有點陳腐了。在他生存的時候，筮卜 (oracles) 之風固然甚行，頗與殷周之習相似。然希氏一面求翔實客觀的記載，一面自己也沒明白反對 oracles 與夢兆，因為在他書裏常常提到神靈可以干涉人的行動，可以決定人的成敗與幸福，以筮卜之結果，決定國家大事的行動；好像卜辭為人神之間的交通媒介。好些史事的因果，好像為超人力 (supernatural agents) 或個人的狂念，或歷史傳統所決定⁽³⁹⁾。稍後 Thucydides 就拋除了神怪的籠罩。司馬遷雖然也有非人力也的解釋，却没有希氏相信迷信與神奇之深廣。司馬不忽略流行的筮卜之事，為社會現象之一，而將這一類事情，歸納于日者列傳與龜策列傳之中，可是並沒有把這兩部份寫完。現在這兩篇，是褚先生等人東抄西補的。

(5) 優點與劣點

這兩大家的優劣之點，已屢經前人批評與誇獎，如班彪云，“採經摭傳，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疎略……欲以多聞廣載為功，論議淺而不篤”。班固云，“以身陷刑之

故，徵文譏刺，貶損當世”。在西洋有以希羅多德為撒謊之王，(Prince of Liars) 抄竊大家，從別人書中，雜採故事，而不注明出處者⁽⁴⁰⁾。這些批評，不完全確當，前人辨之詳矣，不必多事重述。有一點當申明者，希羅多德之書，生前似已完成，並屢加文字上的推敲，死後數年，書中內容，已是家讀戶誦，凡是受了教育的人都已熟悉。原書流傳至今，少經竄亂。司馬遷之書，當他死時，未必已成寫定本，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107-125)外孫揚惲始宣布其書，其後褚少孫等人補之，楊終刪之。將史記自序中所說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刪去十餘萬言，其後又經劉歆等人竄亂，以致現在約有六十萬字左右。史記的書名也是在漢靈帝獻帝(170-220)的時候，才確定的⁽⁴¹⁾，漢晉名賢，未將此書見重，大概在他死後三百餘年，至晉末徐廣(352-425)，始加以研究，作史記音義。故史記有許多校讎與考證學上的問題，不在此文中討論的範圍之內，但在作大概的比較時不能不提到兩書的傳授系統。

在結構與組織方面，司馬遷最大的貢獻，是鑄成一個歷史的模型，可以包羅萬象，並用之於古今中外。不但中國歷朝正史用這個模型，日本史用之；近年羅爾綱寫太平天國史亦用之。甚至於美國史，也未始不可以此模型駕馭材料。如將各大總統作本紀，Adams, Morris, Rockefeller, and Ford 等作世家；將各科學家，文學家，實業家，電影明星作列傳，將社會，經濟，交通，地理等作專題研究；將各州發展史，內亂與大戰進展史作年表，則全部美國史，亦可以包羅排列，有的部分供人閱讀，有的供參考。所以司馬遷史記其應用，已非常廣博與攸久。希羅多德之書，沒有他這樣的體大思精。

從內容方面看，史記的優點，是包括全社會各階級二千餘年的通史。其中材料，多經過謹慎的搜羅與選擇。這也是希羅多德最大的長處。希氏的書是一部最初最大的文化史，包括無數有趣味的題材。他的歷史可說在史學上有三大貢獻，一為記載人類各種活動，二為盤根索源，三為將近代史看作世界史，而不拘于一時一地的歷史。從趣味與驚人的故事方面看，希羅書中的內容比司馬遷的更有意思。司馬遷有時客觀的記述歷史事實時，在初學者與外國人讀之，不免枯燥無味。因為司馬遷在本國遊歷，各地的語言習俗，他早已了解，風俗人情，早已司空見慣，好些趣事，毋庸描寫。希氏在外國遊歷，外國的語言，他多半不明了，要依賴導遊者或翻譯者，供給他的材

料，凡是新穎的令人動聽的東西，他都很小心的記載下來了。用現代的眼光看，有的故事，雖然有趣味，却沒有很多歷史價值。有好些政治經濟的資料，司馬遷非常注意，而希氏却忽略了。司馬遷作正式的歷史，或簡稱正史，希氏作非正史的歷史。所以有兩位英國學者說：希羅多德對於上古與偏遠地方的記載，常常傾向于接受奇異的故事。他書中充滿了有趣味的跟有教訓的故事，但不一定有歷史的價值。他缺乏時間觀念，使他的記載，有時先後失次，前後矛盾。他神學觀念太重，使他不能深刻明瞭歷史的原因⁽⁴²⁾。

有幾種希羅多德的短處，恰是司馬遷的長處。希氏缺乏歷史的年代知識與工具，而司馬遷對於年代系統，非常留意，非常清楚，所以他能作出各種年表。中國上古史，若非司馬遷理清年代，提綱挈領，則其錯綜複雜，恐不亞于印度史。所以傅孟真認為“整齊殊國紀年”，為司馬遷史學特色之一。

希氏描寫軍事與戰場情形，亦甚薄弱。而司馬遷能寫得生龍活動，有聲有色，如項羽紀，幾乎可以作電影。希氏描寫許多古代國家，對於地理學有貢獻，而他本人的地理智識，並不見佳。如說 Dauube 發源于 Pyrenees 而往南流。司馬遷對於地理學却特別見長，藤田元春認為司馬遷是世界上人文地理學最初開拓者，他注重交通經濟地理，並建立自然與人文地理的關係⁽⁴³⁾。此外，司馬遷對於地位與方向觀念，(sense of direction)。特別見長。從他的著作中，我們可以想像，凡是他所去過的地方，他可以劃出一個地圖。故凡寫戰場上的行軍布置及排列，宴會席上的座位，他皆以東西南北等方向，描寫得瞭如指掌。

希氏不注重政治史事，而司馬遷特重政治史事。

將兩書的內容略加分析與比較，我們可以說，西洋若無希羅多德氏之作，其損失尚小；中國若無司馬遷的史記，其損失甚大。

就文章價值說，兩人皆很高超，西洋如 Cicero, Byron, Hume, Gibbon, Macanlay 等人皆讚美希羅多德的文筆，為散文生光輝；中國如揚雄，韓愈，柳宗元，章學誠，曾國藩，各大家皆服膺司馬遷之文筆，為唐宋元明散文之模範。在文章高妙之中，希羅長于說故事，折衷異說，辨別事理，有現代科學家的態度。司馬長于寫傳記，寫個性，有戲劇與雕刻家的天才，稍為引申，當引 Macan 對於 Herodotus 的

評論：

Upon the materials which reached him one way or another, at various times and various places, the mind of Herodotus seems to have exercised a two-fold action, for the one-part critical and selective, for the other representative and creative. A very large part of the text of Herodotus, is occupied with the express statement and exposition of his own opinions, views, judgements, while indirectly and inferentially this element is largely reinforced by his methods of historiography.⁽⁴⁴⁾

這是對於 Herodotus 最恰當，最有力量的估價。因為希民有這樣的本能，所以雖然常常穿插，離題說話，而加入的故事，材料，本身有趣味，不使讀者厭倦，可是他書中的長篇演說詞，十之八九，是他想像虛構的。雖然寫得適合身份，洽到好處，而其歷史價值，不無疑問。

在司馬遷史記裏大大小小，表現好幾百不同的個性人物，比水滸傳與紅樓夢所表現的人物，更為顯著，他能寫出各種不同的喜怒哀笑。常模擬各種身份不同的人所說的話，所用的字眼，常用漢代的白話解釋古典，使明白易曉，他避免穿插離題，而用詳略互見的方法，使文章清潔，他最善于用虛字，如之乎也者之類，將文章表現得輕鬆流暢，常露出法外之音，言外之意，使人閱讀之後，覺得有餘韻，有雋永之味，情不自禁地發生回想。他確是以詩人的性格寫歷史。但他書中的所引的長篇說詞，却不是臆造的。所以魯迅說：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⁴⁵⁾”同樣 Macan 也說：

The work of Herodotus is a prose Iliad and Odyssey in one rich in episodes and details and more disputedly one and indivisible than either Epos. (46)

就態度方面說，希羅多德為希臘人而記希臘與波斯之爭，雖然有時免不了左袒或歌誦典雅人，而對於波斯人與其他野外人的記載，還算公平翔實⁽⁴⁶⁾。司馬遷有詩人的性格，而兼受了腐刑，雖然有時不免以感情用事，如對於漢武帝與當時人物如李廣將軍，等略帶諷刺之意，把漢武帝寫成一個迷信極深神經病狂之人（參今之本紀，封禪書，與龜策列傳）而武帝之窮兵黷武，求神求仙，皆為事實，值得譏評。史記全

書，對於人物的選擇，事實的申述，皆不失史家公謹，與冷靜的態度。

總之，希羅多德爲業餘史學家，司馬遷家爲專門史學家。兩人比較，強弱互見。(Thucydides 與班固，才能好好的對比)。古代文史不分，二人皆爲最大的文學家。他們的散文，充滿了幽默與詩意。希羅多德用紀事本末體，如章回小說，偵探小說，原原本本，系統分明，條理井然。司馬遷用紀傳體，其組織之周密，包羅正式史料之廣博（如政治，人物，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似較希羅多德目光遠大，思想慎重。而希氏以客觀的態度，用數目字的描寫，討論衆說，折衷已見，似較司馬遷爲科學化。兩書影響東西史學界頗大。東西史學之興趣，已發端于兩大鼻祖。讀西洋史書如吃雜碎 (chop suey) 葷素作料，皆混合之，讀者讀之而已。讀中國正史，如吃西餐。本紀如牛排，列傳如素菜……讀者須自加抉擇，自己調味。東尋西找，頗費工夫。“把歷史割裂爲無數的碎片，誠爲紀傳體最大的缺點”(47)。希氏講故事的方法，爲我們保存好些史料，否則已被人遺忘。講通史者也許仍然要奉希氏的方法，爲教通史之金科玉律罷。

註

- (1) Herodotus 的生卒年代，有的作 484-428? B. C. 有的作 484-425 B. C 有的說，Herodotus was born "not long before 480 B. C." "His death occurred a little after 430." *Martin Classical Lectures*, I, 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0) The edition of Herodotus used in this essay is George Rawlinson's translation, and Rawlinson's translation edited by Manuel Komroff, New York, Tudor Publishing Co., 1941.
- (2) 司馬遷的生卒年代問題，至現在尙爲熱烈辨論之點。其最普通的生年有二，一爲史記索隱說，生于建元六年 (135 B. C.) 二爲史記正義說，生于中元五年 (145 B. C.) 1911年王國維作太史公繫年考略，即根據正義說。1929鄭鶴聲又依據王國維之說，作司馬遷年譜，皆以遷生于145年。1934桑原隲藏駁王國維說，以遷生于135年。(《東洋文明史論叢》，261-276)。以後施之勉主135年說(《東方雜誌》40.16 (33.8) 30-34)。李長之也主張135年說(《國文月刊》47 (1946) 8b-9; 1954曲顯生“太史公行年考辨誤補證”，斷定司馬遷生年，實爲135 B. C. (《大陸雜誌》8.2 (January, 1954) 78)，1955郭沫若，劉際銓，力證太史公生年爲135 B. C. (《歷史研究》5 (1955 十二月) 1956 一月鄭鶴聲，重版司馬遷年譜，極力反駁135年說，而維持145年生之說。兩說雖各有理由，實難作具體決定。比較起來，似以135年爲較近情理。其卒年在86或87亦無法考定。
- (3) 參李長之，“司馬遷之史學及其他”，《東方雜誌》42-10 (1946) 39-40 李氏論史記各文，陸續在《東方雜誌》，《國文月刊》等雜誌發表。後又印成單行本。因單行本一時找不到，仍用他在雜誌上發表之文章。
- (4) 司馬遷自己說，“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闢九疑”，當時交通不發達，在中國本部各省旅行一次，必費長期的時間。以後仕爲郎中，又西至空桐，奉使巴蜀滇中。這些事實鄭鶴聲司馬遷年譜（頁32-54 1956 重印本）言之甚詳，可供參考。

司馬遷與希羅多德 (Herodotus) 之比較

- (5) 本文用瀧川資言，史記會注考證本。
- (6) “6 史記研究”，傅孟真先生集，中編，戊 1-17。
- (7) Sir JOHN SANDYS, *History of Scholarship*, Vol. I, p. 371 and T.R. GLOVER, *Herodotus*, p. 20.
- (8) J. ENOCH POWELL, *History of Herodotus*, (Cambridge, 1939) p. 29.
- (9) HERODOTUS 只知道大夏 (Bactria) 和康居 (Sogodiana) 都向波斯納貢，只知道波斯于侵入希臘時，兩地皆曾出兵助薛克斯王 (Xerxes)；至于這兩地的高山大嶺，希氏似乎一無所知。他雖然知道阿爾泰山 (Altai)，但關於在波斯境內或邊界上的帕米爾與都庫什斯或喜馬拉耶等山的知識，則絕無所有。希氏對於裡海以東的平原，只說他是一片廣漠無垠的荒地。參吳祥麟“希臘與西域及張騫之通使”，留日同學會季刊第一號，5-13 頁。
- (10) W. W. HOW,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Oxford 1912) 17, and JOHN L. MYRES, *Herodotus. Father of Hist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3) 5.
- (11) J. L. MYRES, “Herodotus and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y and Classics*, edited by R. R. Marett (Oxford 1908) 121-168.
- (12) 詳參“史記中的神話傳說和初民遺俗材料索引”，培正中學圖書館刊，一卷二期。
- (13) L. R. FARNELL, *Outline History of Greek Religion*, p. 9; and ADOLF ERMANN, *Egyptian Religion*, p. 175.
- (14) J. ENOCH POWELL, *The History of Herodotus* 86, 203-204.
- (15) 李長之之把司馬遷受腐刑事，寫得有聲有色。他也說，“司馬遷只活到四十六歲，或自殺死，亦未可知”。參“司馬遷與李陵案”，東方雜誌 41.7 (1945 四月) 49-58
- (16) “昔西伯拘於里，演周易。孔子居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孫子贖脚，而論兵法。……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皆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130 28-29
- (17) “We cannot ascertain whether he [Herodotus] was single, or married, or the name of any of his closer friends or relative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5, ch, 14, p. 417.
- (18) JOHN L. MYRES, *Herodotus, Father of History*, 2.
- (19) JOSELP WELLS, *Studies in Herodotus* (Oxford 1923) 201-203.; and T.R. GLOVER, *Herodotus*, 194-95.
- (20) *The History of Herodotus*, translated by George Rawlinson, edited by Manuel Romroff. (Tutor Publishing Co.; 1941) vii-viii.
- (21) 中山久四郎，“司馬遷學之二大特徵”，史潮 7.2 (1937—月) 22-28
- (22) 鄭樵，邵晉涵，章學誠等。謂司馬遷的紀，傳，表，志，體爲因襲，非創始，是不確實的。邵氏江南文鈔，史記提要曰，“遷文章體例則參諸呂氏春秋而稍爲變通。呂氏春秋爲十二紀，八覽，六論，此爲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按呂氏春秋體例，與史記絕不相同。邵氏之言，牽強特甚。參程金造，“史記體例溯源”，燕京學報 37 號 (1949) 95-120；及羅根澤，“從史記本書考史記本源” 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4.2 (1930) 7-20
- (23) ARNOLD J. TOYNBEE, *Greek Historical Thought*, xixff.
- (24) JAMES T. SHOTWELL, *The Writing of History*, 169-70 and *passim*.
- (25) JOHN L. MYRES, *Herodotus*, 64.
- (26) 史記可能出自司馬談手筆者有：孝景本紀，律書，晉世家，老莊韓申列傳，刺客列傳，李斯列傳，酈生陸賈列傳。詳參李長之，“史記各篇著作先後可能的推測”，東方雜誌 40.32 (1944) 39-57
- (27) 羅根澤，“從史記本書考史記本源”，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 4.2 (1930) 7-20
- (28) “疑者闕焉”，(高祖功臣年表)。“故疑者傳疑，蓋其慎也”(三代世表)。“或言”，“或曰”(老莊列傳)。“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傳贊)。

- (29) 史記卷十五六國年表序，“是秦之兵不如三晉之疆也，然卒並天下，必非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卷十六，秦楚之際月表，“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卷二三禮書敘，“宰制萬物，役使羣衆，豈人力也哉！”卷五五留侯世家贊，“豈可謂非天乎？”卷六一伯夷列傳，“余甚惑焉，微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卷九八傳靳黈成列傳，“此亦天授也”。卷一二七日者列傳，“自古……王者之興，何嘗不以卜筮決于天命哉”。
- (30) 如“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64.9)，管晏列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62.10)。吳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論；論其行事所設施者“(65.19)。”自如孟子至于荀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74.14)。
- (31) 參內藤虎次郎，支那史學史，p. 125
- (32) JOHN L. MYERS, *Herodotus* p. 9.
- (33) It is the normal rule of Herodotus, when he is writing on points of geography, not to make definite statements about regions of which his knowledge is worse than secondhand. With regard to Western Europe he makes his attitude perfectly clear in iii, 115 when he refuses to believe definitely in Eridanus (Rhodanus) saying that he has not been able to obtain the authoritative statement of an eye witness that there is an ocean on the farther side of Europe. Lionel Pearson, "Herodotus on the Source of the Danube", *Classical Philosophy*, 29 (Oct. 1934), 328-337.
- (34) GLOVER, 155.
- (35) MYERS, 176, and MARTIN, 14.
- (36) MARTIN, 9.
- (37) T. R. GLOVER, *Herodotus*, p. 146.
- (38) JOHN H. FINLEY, Jr., *Thucydides*, 23-24.
- (39) MACAN, *Herodotus*, vol. 1, vii-ix, lxxxvii; Glover, 267; and Myers, 57.
- (40) 詳參宋高似孫，史略 I, 6-15；(古逸叢書本)；*Les Memoires Historiques de Se-Ma Ts'ien*, translated by Edouard Chavannes, t. I, CLXXXI-CXCVI and CCXXII-CCXXV; and John L. Myers, *Herodotus*, 17-31.
- (41) 李奎耀，“史記決疑”，清華學報 4.1 (1927 六月) 1175-1275；楊明照，“太史公書稱史記考”燕京學報 26 (1939 十二月) 191-214
- (42) H. H. HOW and J. WELL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Oxford, 1912), 1-40.
- (43) 藤田元春，認為司馬遷是世界上人文地理學最初之開拓者，足跡遍十八省，他是“當時第一流之實際地理學者”。史記全書中對於地理學有明確之認識，八書中之河渠書，實為當時之漕運水利，即當代之交通地理學。平準書，貨殖傳為經濟地理學，他注重陝西盆地，巴蜀盆地，齊魯平原。他在西域匈奴等傳，注意外國地理。他建立自然與人文之間的關係，確定地理區域的劃分。詳參“司馬遷的人文地理學”，立命館文學 1.12 (1934) 1595-1616
- (44) REGINALD W. MACAN, *Herodotus the 4th, 5th and 6th Books* (London 1895). I, cii.
- (46) 魯迅全集 10.581
- (46) MACAN, *op. cit.*, lxxiii; and *Martin Classical Lectures*, 16-18.
- (47) “論司馬遷的歷史學”，中國史論集，37-74